

忆大山

习近平

1月12日,石家庄市作协副主席康志刚在其新浪博客上贴发了习近平同志的《忆大山》,已故作家贾大山的获奖作品《花市》和他自己的《怀念恩师贾大山先生》三文。习近平同志的《忆大山》一文,反映了习近平同志上世纪80年代在河北正定期间与已故作家贾大山的深厚友谊,及调任福建担任更高职务直至贾大山去世,与其十余年间历久弥坚的交往,饱含真情,十分感人。

贾大山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。他去世以后,在他的家乡正定,在他曾默默耕耘了二十多个春秋的当代文坛,引起了不小的震动。昔日的同事、朋友和所有认识他、了解他的善良的人们,无不深切地怀念他,许多文学界的老朋友和他家乡的至交,怀着沉痛的心情,写下了一篇篇情真意切、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。一个虽然著名但并不高产的作家,在身后能引起不同阶层人士如此强烈的反响,在文坛、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如此丰厚的纪念文字,可见贾大山的人格和小说艺术是具有何等等的魅力。

1982年早春,我要求离开中直机关到基层锻炼,被组织分配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。那时,贾大山还在县文化馆工作,虽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,但其《取经》已摘取了新时期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桂冠,正是一颗在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。原来我曾读过几篇大山的小说,常常被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、富有哲理的辨析、真实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思所折服。到正定工作后,更是经常听到人们关于贾大山的脾气、性格、学识、为人的议论,不由地让人生发出一种钦敬之情。特别是我们由初次相识到相熟相知以后,他那超常的记忆、广博的知识、幽默的谈吐、机敏的反应,还有那光明磊落、襟怀坦荡、真挚热情、善良正直的品格,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

我到正定后,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对象就是贾大山。

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,我在工作人员陪同下到大山居住的小屋,相互问候之后,便开始了漫无边际的闲聊,文学艺术、戏曲电影、古今中外、社会人生,无所不及,无话不谈。虽然第一次见面,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,有说不完的话题,表不尽的情谊。临别时,他还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:“近平,虽说我们是初次见面,但神交已久啊!以后有工夫,多来我这儿坐坐。”他边说边往外送,我劝他留步,他像没听见似的。就这样边走边说,竟一直把我送到机关门口。

此后的几年里,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了,有时他邀我到家里,有时我邀他到机关,促膝交谈,常常到午夜时分。记得有好几次,我们收住话锋时,已经是次日凌晨两三点钟了。每遇这种情况,不是他送我,就是我送他。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的休息,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,一人先蹲下,另一人站上肩头,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。

1982年冬,在众人举荐和县领导反复动员劝说下,大山不太愿意地挑起了文化局长的重担。虽说他的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,可当起领导来却不含糊。上任伊始,他就下基层、访群众、查问题、定制度,几个月下来,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。在任期间,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、保护、维修、发掘、抢救,竭尽了自己的全力。常山影剧院、新华书店、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,隆兴寺大悲阁、天宁寺凌霄塔、开元寺钟楼、临济寺澄灵塔、广惠寺华塔、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,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。

作为一名作家,大山有着洞察社会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独特视角。他率真善良、恩怨分明、才华横溢、析理透澈。对人们反映强烈的一些社会问题,他往往有自己精辟独到、合情合理的意见和建议。因此,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,我还更多地把他这里作



贾大山(1943年—1997年),汉族,河北正定人。1964年中学毕业。曾任正定县文化馆馆员、正定县文化局局长、河北省政协常委、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1971年开始发表作品。著有短篇小说《取经》等。《取经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等。

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,把他作为我行政与为人的参谋和榜样。

大山是一位非党民主人士,但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、人民的命运割裂开。在我们党的政策出现某些失误和偏差,国家和人民遇到困难和灾害的时候;在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、发生局部动乱的时候,他的忧国忧民情就表现得更为强烈和独特。他利用与基层民众水乳交融的关系,充分调动各种历史和文化知识,以诙谐幽默的语调,合情入理的分析,乐观豁达的情绪,去劝说人们、影响人们,主动地做一些疏导和化解矛盾的工作。同时,他更没忘记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,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,尽情地歌颂真、善、美,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假、恶、丑,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,增强明辨是非、善恶、美丑的能力,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,对生活充满信心,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。

我在正定期间,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,得到大山很多的支持和帮助,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。记得1985年5月我即将调离正定去南方工作的那个晚上,我们相约相聚,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,临分手时,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,依依别情,难以言状。

我到南方以后,曾经给大山去过几封信,只是大山甘于恬淡寂寞,不喜热闹,未有及时回应。以后我也因工作较忙,很少给他写信了,只是偶尔通个电话,送上衷心的感谢和祝愿。我还曾多次让人捎信儿,希望他在方便的时候,到我工作的地方去走一走,看一看,可他总是说我担子重、工作忙,不愿给我添麻烦。虽然接触联系少了,但我们之间的友情并未随日月流逝而淡漠,他常向与我联系较多的同志探询,密切关注着我的工作情况和动向,我也经常向到南方出差的正定的同志询问他的身体、工作和创作状况。每次见到正定的同志,我都请他们给他带去一些薄礼。每年春节前夕,我总要给他寄上一张贺卡,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愿。

1991年春节,在离开正定6年之后,我受正定县委之邀,又一次回到了我曾经工作和生活了三年

多的第二故乡——正定。我抽时间专程到家里看望大山。那时他已主动辞去了文化局长职务,到县政协任专职副主席了。他依然那样豁达乐观、诙谐幽默,依然那样身板硬朗、精神矍铄,并依然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同时坚持着他的小说创作。那年,他还不到50岁,正当精力充沛、创作欲望非常强烈的黄金时期。他告诉我,什么小说在哪个杂志发表了,什么小说被哪家刊物转载了,正在构思或写着什么,显得非常兴奋。那次相见,由于时间关系,我们没能长谈,便依依惜别了。

1995年深秋,我从一个朋友口中得知大山患病并已做了手术,尽管说手术相当成功,还是给关心他的人心头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。我不时打听着他是否康复的消息,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:他的病情不见好转,却一天比一天更瘦了。后来,听说他到省四院做了食道扩张治疗,能吃进一些流食了。再后来,听说又不行了,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诊断检查。刚好,我前几天正在北京开会,便抽空到医院去看望他。见到他时,眼中的大山早已不是昔日大山的模样,只见他面色憔悴,形体枯槁,蜷缩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,只有那两只深深凹陷进去的眼球,还依然闪烁着流动的亮光。他看到我进来,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,紧紧握住我的双手,激动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。稍微平静些后,他就给我述说病情的经过。我坐在他的床头,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,尽管这种语言已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。那次见面,我们两人都显得非常激动,因为我知道,恶魔般的细胞,此时已在大山的肝脏、胰脏和腹腔大面积扩散。我不忍心让他在病疼之中再过于激动,为了他能得以适度的平静和休息,我只好起身与他挥泪告别。临走,我告诉他,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。

1997年2月9日,是农历的正月初三,我又一次回到正定,再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去看望大山。这时的大山,身体的能量几近耗尽,他的面色更加憔悴,形体愈显瘦小,声音嘶哑,眼光浑浊,话语已经不很连贯,说几句就要歇一歇。此时我心中已有一种预感——恐怕大山的驾鹤西去为期不远了。至此,一股悲怆的情绪油然而生,我不由自主地紧紧握住大山的手,泪水溢满了眼眶。这时的大山,却显得非常平静,倒是先安慰起我来。我提出再和他照张合影,他笑着说:“我已瘦成这样,不像个人样儿了,叫人看见怪吓人的呀!”他虽是这样说,可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。这张照片,成了我和大山,也是大山和别人最后的一张合影。

2月21日,在我刚刚离开正定才十来天,突然接到电话告知——著名作家贾大山于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,享年54岁。

噩耗传来,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。大山的逝世,使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、好兄长。我最多想亲自去为他送行,再看他最后一眼哪!无奈远隔千里,不能前往,也只能托人代送花圈,以示沉痛悼念了。

大山走了,他走得是那样匆忙,走得是那样悄无声息,但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愫,清正廉洁,勤敬敬业的作风,襟怀坦荡,真挚善良的品格,刚正不阿、疾恶如仇的精神,都将与他不朽的作品一样,长留人间。

(转自《光明日报》,此文原发表于《当代人》杂志1998年第7期)

整整齐齐邵逸夫

早上起来,漫山遍野都是邵逸夫离世的消息。在网友总结的TVB高频率台词中,有一句话特别能代表TVB或者说邵逸夫精神:最重要的是一家人整整齐齐,开开心心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句台词说多了,每年的TVB全家福也成了香港的娱乐重头戏。

作为TVB的家长,邵逸夫都会在台庆当天和TVB旗下明星合影,每年看到这张全家福,看到花团锦簇还在,比谁都老的邵六叔依然整整齐齐,邵氏粉丝就觉得生活可以继续。回顾邵逸夫一个世纪的人生,谁都觉得他是整整齐齐过了一生。

邵逸夫走了,无数观众追忆他为香港电影立下的功劳打下的江山,历数他天南地北捐建的图书馆、医院。不过,看得多了,原来立体的邵逸夫倒变得有些单薄,似乎被简化成了一个大概慈善的影视实业家。不是这样的吧,邵逸夫的“整齐”恰是因为他把百年影视史全部走了一遍,包括栈道和歧路。

很多人惋惜他当年因为片酬谈不拢放走了李小龙,邵逸夫自己后来也很懊恼。但是,今天看看,这却是邵氏王国的终极秘诀:电影公司既要靠明星,但更要明星之间的彼此平衡。这种家族式平衡,在邵氏公司,既是一种商业模式,却也很有意思地发展出一种电影风格。

我每次重温邵氏电影,总感觉到一种类似的“齐整性”,这种齐整性不仅表现为邵氏电影中的家人团聚戏多,而且演员表演也相对齐整。而作为电影美学的“齐整”,邵逸夫领导的电影公司几乎穷尽了所有的电影类型。在这个意义上,邵氏在香港电影史中的地位,的确无人能及。

(作者:毛尖,转自《文汇报》,有删节)

不必把年薪写在脑门上
证明成功

当我们谈到社会中物欲横流时,最为通行的辩护词,就是“中国的发展水平尚低,没有追求精神的条件”。问题是,物欲并没有随着物质的丰富而降低,许多有钱的中国人来到美国也一样。

最为戏剧性的,大概是我在微博上的遭遇。作为大学老师,我有感于留美中国学生在商科扎堆的现象,把美国最权威的薪金网站PayScale上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起薪和年薪表贴出来,证明商科专业毕业生的日后收入很低,甚至比我的本行历史专业还低。没想到,有位名头挂着“王健-美联储”的,立即出来斥责我是穷酸文科教授因无知而攻击商科,还称他认识的商学和经济学教授的工资至少比我高两三倍,不像我这样不学无术整天瞎说。

这位“美联储”的头衔像是真的。他所说的商学和经济学教授工资至少比我高两三倍,恐怕也符合事实。但是,没有人会说工资低就是不学无术。“美联储”猜想别人的收入低,就是“不学无术整天瞎说”。这恰恰反映了海外某些中国人脱不去的价值观:他们恨不得把美元贴在身上,把年薪写在脑门上,以证明自己的成功。

我们不妨再看看:为什么PayScale上的数据显示本科商学专业学生日后收入比历史专业的还略低?《华尔街日报》上曾有篇报道提及:商学本科毕业生日后很难当商学或经济学教授,甚至日后进商学院MBA等课程的竞争力都不如文科学生。历史专业本科毕业的学生有些确实拿很低的工资,但有些则去了商学院、法学院、医学院等。所以,平均下来,到了中年后收入反而略高些。

其实,在美国本科就读商学的中国学生,其逻辑很实际:先顾温饱,学点能马上挣钱的技能。那些本科选择了历史、文学的学生,人类命运、情感等“意义问题”往往更为迫切,而对整个社会乃至人类有着强烈关怀的人,往往素质更高,而且日后的个人事业也比较容易成功。

年轻人一旦接受了这种用物质来界定成功的价值观念,就会从一开始就追求最低等级的满足,限制自己的人生视野。

(作者:薛涌,转自《南方都市报》,有删节)